

**编者按:**5月2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为配合落实《“双减”意见》,各地教育监管部门8月以来纷纷制定出台“双减”细则。

针对考试,教育部在8月30日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明确小学取消期中考试;对初中小学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一般分4至5个等级,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得通过考试设置重点班、实验班。

8月31日,巨人教育宣布倒闭。这所主打“中小学培优”的校外培训机构已成立长达27年、累计服务过500万学生,曾被称为“校外培训的黄埔军校”,2018年被精锐教育收购。据财新网报道,精锐教育现已做好从美股退市的准备。

“双减”政策风暴之下,所有这些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变化,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把中国义务教育重新拉回到一个应有的平衡局面:一方面是充分发挥学校教书育人主体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对线上线下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实施“双减”政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

本期推出“‘双减’之下”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共同探讨“双减”减什么、为什么减、如何减、从哪里减起、减后怎么做等各方面问题。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 本期专题·“双减”之下

- 02 一文全看懂“双减”政策
- 06 逃不脱的家长,戒不掉的培训?
- 10 教培行业:从巅峰迅速跌落
- 15 人口忧思:“双减”“三孩”政策的逻辑基本盘是什么?

### 悦读时光

- 20 不读书的人,才爱说“文学已死”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祁 杰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62528568  
邮 箱:1015873743@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1年8月31日  
印 数:9200-9400

# 一文全看懂“双减”政策

近几年来,在各路资本加持下,教培机构不仅跑出了一条星光灿烂的大道,更是成就了不少独角兽。然而,教育机构赚得盆满钵满之余,“内卷”向家长和学生渗透,教育行业乱象频发。不过,这种乱象就要被整治了。

## “双减”政策解读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 1.什么是“双减”政策?

相信经常冲浪的你,在浏览各大新闻/资讯网站时多少都会弹出过这个字眼——“双减”政策。

于冲浪选手而言,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对于家里没有孩子又甚少接触时事的人来说,便是“想破脑袋”也不明所以然。

简单来说,“双减”政策就是做两大减法,一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二是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 2.“双减”政策有什么意义?

首先,为提高教育质量,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其次,“双减”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

最后,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严重问题的机构。

总的来说,学生端就是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除了学科类的成绩也能在别处(德智体美劳)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机构端则是严禁资本运作、从学生和家中牟取暴利。

### 3.“双减”政策落地各省(市)是如何做的?

7月下旬,国家正式颁布落地了传闻许久的“双减”政策。8月11日,国务院发文明确“双减”半月通报制度,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通报重点是各地作业时间达标学校情况、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情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

据了解,“双减”政策会率先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郑州、长治、威海、南通、成都九个城市试点,其他省份则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海南、江西等地已经陆续发布“双减”政策细则,相关内容整体上与中央出台的全国性“双减”政策保持一致。

从各省(市)发布的具体实施文件来看,都强调了关于“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以及“外资不得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等监管

要求。节选部分省(市)及细则如下:

(1)广州:提出了以“一少两优三提”为主要举措

8月14日,广州发布了具体的“双减”细则。通知重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彻底摸清清楚培训机构数量,督促机构每周五前在平台上更新机构相关信息;不再新审批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周末、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不得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8月26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通知》,提出了以“一少两优三提”为主要举措,“三提”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业设计质量和学生身体素质;“两优”即优化校内课后服务和作息安排;“一少”即减少考试次数。

此外,广州市“双减”细则还提出,推行“5+2”课后服务模式,正常上课日周一到周五都开展,每天至少2个学时,其中至少安排一个学时的基本托管,指导学生完成作业,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

(2)北京:课后服务中不得引入任何学科类的项目

8月18日,北京市发布“双减”政策具体实施措施,提出的目标是,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于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

在北京的这次举措中,也将课后服务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课后服务中不得引入任何学科类的项目,从最大程度上保证孩子的时间,可以通过各种丰富的校园生活,充实课后服务,但是,学科类的项目是坚决不允许引进的。

此外,北京这次发布出来的通知还明确规定:任何关于学科类培训的机构,未来都不允许上市。以学科培训为机构的机构,在未来的时间中也不会被批准。

(3)上海:用1年时间使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管控

8月24日,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中央“双减”工作部署,对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作出具体部署。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用1年时间,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管控,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全面覆盖,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工作如期完成,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

上述意见明确,到2023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校外培训行为全面规范。

###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的出路在哪?

曾几何时,在各路资本加持和推动下,线下线上教育培训类公司狂飙突进,在线教育更是扶摇直上。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增速在2019年逐步递减,用户红利逐渐消退。但2020年,“黑天鹅”事件发酵促使在线教育迎来新的转机,在“停课不停学”的政策扶持下,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增速回暖,市场规模达4858亿元,增速上升至20.2%。

2020年在线教育市场超4800亿元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data.iimedia.cn)

艾媒报告中心: report.iimedia.cn ©2021 iiMedia

不过,“多拿一分、干掉千人”“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内卷”却严重透支着家长和学生的身体和精力,监管已在所难免。

伴随着《意见》和“双减”政策的落地,教培机构也迎来了转型期。8月19日,北京“双减”细则发布后,新东方、好未来均发布公告称,相关新规将对其学科类培训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而言,新东方已停止在北京地区周末、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前暑假期间提供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同日,好未来、网易有道、高途也发布公告表示,根据北京新规目前已

停止在北京地区周末、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前暑假期间的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向非学科类拓展成为不少机构转型的首要选择。例如，新东方北京学校成立了北京新东方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下设艺术创作文化馆、人文发展研究所、语商素养沉浸馆等六大板块，瞄准素质教育、家庭教育市场；近日，好未来旗下“励步英语”也已更名为“励步”，并宣布品牌全面升级，将在全新的励步儿童成长中心推出戏剧、美育、益智、口才、读物五大素质教育产品。

此外，A股上市公司豆神教育也于8月初发布公告称，决定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全面转型，重新规划整合后的主营业务分为ToB端的智慧教育服务业务、优质课程内容进入课后延时服务业务、大屏端视频分发业务；ToC端的艺术类学习服务业务、线上软硬件结合的AI伴学产品。

而早在7月28日，成立于2012年的在线教育公司猿辅导就正式推出国内首个基于AI互动内容+动手探究的STEAM科学教育产品“南瓜科学”。在发布会上，有员工透露，“这是猿辅导的第一个转型动作”。

### “双减”政策落地，哪些赛道迎利好？

目前来看，“双减”政策落地后，教育智能硬件和职业教育将成为热门赛道。

#### (1) 教育智能硬件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教育智能硬件有学习机、点读机、翻译笔、智能护眼灯、教学机器人等多个品种，包含了学生在课堂、客厅、学校、户外等多种应用场景。

据业内人士透露，有道自2017年开始推出智能硬件，目前在扫描笔领域做到行业领先；腾讯入局较晚，2020年推了一台智能台灯，但反响一般；讯飞从2017年开始，从翻译机、学习机、手写板等进入智能硬件领域，发展较快；罗博科技自2016年进入该领域，推出智能手写笔，发展迅速，占到该赛道市场份额50%以上。

不少言论认为，随着近期“双减”政策落地，在线教育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纷纷加速转型，教育领域的多条赛道进一步细分。其中，智能教育硬件备受资本

和各大厂青睐，或接力K12教育成为新的发展重心。

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各大厂商的动作就能窥见一二。8月25日，网易有道携手华为智选联合推出的首款教育智能硬件——华为智选有道智能词典笔正式开售。此款词典笔是两大科技公司将共同探索IOT生态下的教育场景，完成教育与家庭链接的最后一环。

而此前，许多互联网巨头也瞄准了教育智能硬件这一领域。例如，字节跳动成立教育品牌“大力教育”，并推出了一款教育智能硬件产品——大力智能作业灯；阿里也布局教育智能硬件领域，推出了“天猫精灵E1”……

“双减”政策对教育硬件这一赛道意味着什么？“‘双减’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机会大于挑战，未来，将会迎来更多机会。”说起此次“双减”政策对行业带来的影响时，罗博科技CEO殷述军坦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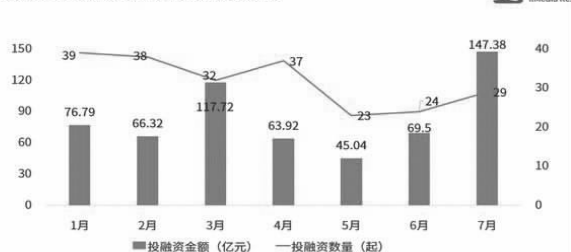
而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则在8月25日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双减政策下，强调回归校内教育主阵地，校内市场容量会增大，科大讯飞基本教育理念和战略布局会更有优势，整体对讯飞的业务形成利好；另外，学生探索自主学习的时间增多，会对学习机的销售形成拉动。

#### (2) 职业教育

“双减”政策前，K12教育是资本的宠儿。但“双减”政策落地后，星光熠熠的K12学科培训赛道趋冷，资本的大船开始驶向职业教育。

艾媒数据中心(data.iimedia.cn)数据显示，2021年1-7月，教育行业共发生222起融资事件，共融资586.67亿元。2021年7月，教育行业共发生了29起融资事件，共融资147.38亿元。与6月相比，融资总金额增加超1倍，融资事件数增加5起。

2021年1-7月教育行业投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data.iimedia.cn)

艾媒数据中心 report.iimedia.cn ©2021 IiMedia Research

而从细分领域来看,职业教育融资数量为11起,居于细分领域榜首;教育信息化以9起的数额排在第二位。K12教育、语言教育、幼教领域融资数量各为2起,而留学、素质教育、教学设备领域融资数量各为1起。

2021年7月教育行业细分领域融资分布

艾媒咨询  
iiMedia Research

数据来源: 艾媒数据中心 (data.iimedia.cn)

艾媒报告中心: report.iimedia.cn ©2021 iiMedia Research Inc.

资本之外,政策也在加码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监管政策,针对培训教育机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依规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审批登记、开展专项治理、强化日常监管,切实规范校外培训秩序,关停部分不合规机构,使得市场获得了部分出清,同时提高了职业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政府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规范行业发展。

而在今年的4月12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全面进入以高质量为主线的新发展阶段;5月14日,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落地,明确支持企业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政策的不确定性被消除;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进行分组审议。这是现行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9月1日起实施以来首次“大修”。草案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是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

事实上,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已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央视财经报道,“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多地学科类培训大量取消,而体育培训则“爆棚”,一些热门项目更是一位难求。据悉,此前深圳教育部门已出台政策,从2021年开始,深圳中考

的体育成绩提高到50分,这已经给体育培训行业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源,加上“双减”政策落地,无疑将给体育培训带来成倍的市场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职业教育行业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5-2019年期间,中国职业培训市场规模整体也呈快速上升趋势。2020年职业培训行业受疫情影响,由于线下课程无法开设,导致市场规模出现大幅下降,市场规模下降至2088.0亿元,同比下滑8.9%。

此外,职业培训机构的总量也不断扩大。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业培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至今中国职业培训机构总量呈上升趋势,截至2021年5月底,存续职业培训机构数量达164678家。从新增机构数量来看,2017年以后,中国每年新增职业培训机构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年注册量达1.5万家以上。

2016-2021年5月中国职业培训机构数量分析

艾媒咨询  
iiMedia Research

数据来源: 企查查, 艾媒数据中心(data.iimedia.cn)

艾媒报告中心: report.iimedia.cn ©2021 iiMedia Research Inc.

总的来说,“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必将面临阵痛期。但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尽管短期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在一段时间内,必将有大量资质不规范的机构受到调查处理,但这对投资者来说无疑也是一次难得的洗牌机会。对教育培训行业而言,监管不严可能形成一个门槛低、管理松懈、违法成本低、短期收益高的环境。不仅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经营者自己也最终将反噬己身。只有监管严格了,才能造就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市场,实现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利益的双赢局面。

(2021-8-31 艾媒咨询)

## 逃不脱的家长,戒不掉的培训?

“双减”政策逐步推开,各地“双减”细则相继落地。

一些教培机构已开始转型。前几天,一则“新东方转型培训父母”的消息在家长群“炸开了锅”,并登上了热搜。新东方北京学校发布说明表示,该课程并非首次推出,父母智慧馆主要为家长提供各类家庭教育的讲座和课程,帮助父母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随后,“优质父母智慧馆”改名为“家庭教育智慧馆”。有网友惊呼:“小时候被培训的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长大了当了父母了培训的还是我们”“合着补课的还是是一波人”……

新规出台后,许多家长表示支持,还有家长仍在观望,也有部分家长开始新的焦虑。据媒体针对中小学生家长发起的专项调查显示,98%的受访家长都或多或少地给孩子报了课外培训机构,其中83.82%的家长选择了学科类培训。整体花费集中在每年2万元到5万元之间。

什么时候起,校外培训成了“刚需”?

有评论称,“双减”政策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积弊甚深的问题作的一次系统性纠偏,这背后的真正逻辑是什么?

文 | 范永茂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国家和政府一直很重视学生负担问题。最早从1955年开始,我国针对中小学“减负”就颁布了20多道政策。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各个地方政府针

对校外学习和各种补习班、奥林匹克班也采取了诸多治理整顿措施,希望落实解决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问题。

2018年是近年来国家出台关于中小学减负政策最密集的一年。当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这是我国“减负”史上第一个多部门联动的专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文件。

今年7月,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就“双减”问题发布文件,第一次在国家最高层面上把学生的“减负”工作纳入到政府正式议程,可见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国家对此的重视程度。

这次的“双减”不仅对学生校内和校外的课业提出了减负的要求,更对校外学科培训类机构上市融资和资本运作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还对如何提升校内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这种治理的力度不可谓不是空前的。各地在中央文件的要求下,也在开始加紧落实本地的“双减”政策,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过去的“减负”,为何总是效果不佳?

各类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减负”政策执行之后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依然沉重。“教育部对京、津、沪、冀、辽中小学的调查显示,学生书包越来越重、学习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视力下降,很多学生不堪重负”。无怪乎有的家长发出“减负=制造学渣”的感慨。

“减负”政策陷入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

减负、家长增负”的怪圈,政策不力也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一道难题。特别是数量庞大的校外培训机构,其发展已被资本裹挟,偏离了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初衷。乱收费、无证经营、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不仅在贩卖焦虑,还损害了家长和学生的利益,到了必须严整的时候。

值得反思的是,以前各地教育部门的“减负”政策和整顿措施,为何总是效果不佳?

一项政策执行陷入困境的因素是复杂的,这种“减负”政策怪圈的出现恰恰说明过去的政策措施未能做到标本兼治。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对真正的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但人们常常用正确的手段解决被错误建构的问题,对问题的实质作出了错误的解读。表面上看似找到了引发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被带入歧途。

这在公共政策理论里就叫做第三类错误。第三类错误的核心是“问题构建”,一项不当或错误的问题构建将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严重者更能构成人为灾害。过去的教育“减负”政策,本质上属于结构不良的公共政策问题。其特点为:

一是政策制定者通常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价值系统去制定政策,而常常忽略整体社会的偏好;减负政策没有从价值出发,仅从问题出发来解决问题,就是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是政策制定者忽略了创新性的政策。在传统的渐进决策模型或者运动式治理下,执行手段单一、



2021年6月21日,江苏镇江市,放学路上的小学生。图 | 视觉中国

执行机制和监控机制不力,无法妥善解决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

三是“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政策法律效力低下、政策执行资源不足的限制,政策制定者无法罗列出所有解决的方案。

四是政策制定者无法预测可能解决方案所有的正面以及负面结果。

中央政府作为“减负”这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家长、学校及培训机构作为政策对象,政府财政及督察系统作为政策执行工具,都影响了最终的效果。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减负”这类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

## 02 “双减”有何不同?

这次国家的“双减”政策,较之前各地方和教育部分出台的政策有了更深入、全面的指导,不仅要求如何做“减法”,还指导如何做“加法”。

《意见》明确要求,要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布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就对提升校内教育质量有了具体要求,比如义务教育严禁违规跨区域招生、中小学严控考试次数、不公布成绩排名、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使用境外教材等。

除了对校内教育质量有要求外,《意见》同时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这是“课后服务”再次在中央文件亮相,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为落实中央对此重要工作的部署,7月1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今年秋季开学后将实现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

这是配合“双减”政策的重要措施,做好课后服务,既能解决广大家长的后顾之忧、增强教育服务能力,又能强化学校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作用,还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提高教育质量,可谓一举多得。

其实从2017年开始,教育部就开始在全国开展课后服务试点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课后服务最初是为解决“三点半难题”而提出的,但课后服

务现在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不仅解决部分家长接学生的困难,还要吸引数学生参加;不仅要提供看管,还要有丰富的拓展;不仅要实现校内减负,还要为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课后服务要成为学校教育综合服务的延伸,体现出学校教育主体性角色的回归和强化。

多地经验也表明,课后服务内容与学校特色相结合、与校内课程相结合,发展特长、培养兴趣,释放天性是增强课后服务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做好课后服务需要创新的做法,教育部提出“小学阶段作业不出校门”,很多家长希望学生能够在校完成课后书面作业,保质保量。这样看来,学校老师在课后服务作业管理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除了可以指导学生完成作业,还可以引导学生质疑,帮助学生释疑,帮助不同层次学生学足学好。课后服务还可以安排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把学生的注意力从电子产品转移到充满意义的现实生活。所以,课后服务看似一个小举措,破解的却是五项管理的大难题,优化的是教育发展的大生态。

### 03 “戒”不掉的需求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长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目前高考这个中国教育的终极指挥棒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家长们只能寄托于孩子学业成绩的提升。“起跑线焦虑”促使家长们要求孩子们“校内学不够找校外,校外学不够找家教”,这是校外培训机构和各科补习班“野火烧不尽”的根本因素。

因为有市场需求就会有生产供给,这种教育需求如果得不到校内教育的满足,必然导致校外教育机构生意火爆。2018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显示,在2017年中国普通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年均支出5616元,其中,一线城市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7781元/年,二线城市为4863元/年。

庞大的市场必然会对资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催生众多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在教育机构的裹挟

里,家长会给予“减负”政策下的学生更多的附加作业,报名更多元的校外培训班,学生“加负”似乎是最“理性”的选择。从教师和学校层面看,一边是来自于教育部门的大政策大方针的号召,另一边则是关乎自身的绩效,在博弈的进程之中,很有可能延续原有的教育方式不变。

总之,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过去的“减负”效果不佳,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是解决了供给侧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需求侧的问题。

而需求的顽固存在是和中国人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不充分的大环境有关。寒门出贵子,普通百姓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竞争饭碗甚至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当代家长们内心真实又无奈的写照。

### 04 供给的不足与不均衡

群众对教育的渴望,面对的却是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与不均衡。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也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的矛盾,以及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均衡。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本身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惠及全社会和全民族。这种服务需要政府承担起主要供给责任。但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我国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

虽然我国于1993年就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也就是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要力争达到4%。而直到2013年,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布整整20年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9%,基本实现了本应在14年前实现的奋斗目标。

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甚至不少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支出都远高于4%。比如,2005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值为4.4%,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5.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为4.3%,低收入国家平均值为3.2%,而我国当年的比例仅为2.7%。



这20年的经费保障不足,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严重不足。教师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在教育支出里,也存在着结构性不均衡。财政性教育支出投入最大的是高等教育,其次是高中和职业教育,比重最低是义务教育。

在高等教育投入中,985/211与非985/211、名校与普通学校、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待遇也相差悬殊。高等教育如此,义务教育更是问题重重,城市与农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向城市地区倾斜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也给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 05 “减负”,需要做“加法”

所以,义务教育“减负”,走出过去政策循环的怪圈,不能纯粹依靠取消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减法”,因为这不能根本上消除家长的担忧和市场需求,而要更多依靠做“加法”,建立“减负”政策长效机制,需要根据价值确定目的,根据目的确定目标,根据目标确定途径。

第一个“加法”是政府要在国家层面从财政支出上保障教育支出的合理性增长,逐步增加教育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努力提高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2019年7月7日,江苏常州,等候孩子从兴趣班下課的家长。图 | 视觉中国

第二个“加法”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占全部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比重,使得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支出的比例接近于合理或相似的水平。发达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大致保持在1:1:1的水平。这样才能使更多优质人才和资源下沉到义务教育阶段,下沉到农村地区,下沉到中西部地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第三个“加法”是要统筹好校内校外各类优质教育资源,让校外的优质资源回流校内,使得每个孩子在校内能享受到优质的教学服务。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或者政策激励,引导校外教育资源有序向校内流动,使得盈利的教育资本反哺给校内教育。此外,还要建构综合的“减负”政策评价指标和长期的监督管理机制,并及时跟踪、评估与反馈。

第四个“加法”是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合理规划,整合地区内的教育资源。比如,在一个城市内,统筹市内义务教育资源,促进学校之间的相互帮扶,平衡不同城区教育资源的差距;在一个省范围内,也尽量平衡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

第五个“加法”是家长和学校的加法。家长要做好陪伴孩子的加法,而不是把学生推给教育培训机构,也不要“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自己孩子学习负担的“原罪”;学校要有综合素质的加法,减了不必要的学业负担,但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探究的天性,给学生更多自我成长锻炼的机会,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探索如何更好地因材施教。

第六个“加法”是社会的加法。全社会要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准则,推崇任何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鼓励年轻人的成才多元化选择之路,不刻意渲染“尖子生”“状元郎”,正确对待学业优秀学生的励志经验。

总之,义务教育“减负”不是单一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到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家长与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做好学生课后的“减法”,政府、学校要为学生“减负”做足“加法”,提供好政策保障。

(2021-8-17 瞭望智库)

## 教培行业：从巅峰迅速跌落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也要欺骗回生活。”

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电影里讲了三个被生活欺骗了的失败者，去成功欺骗回生活的故事。这算是中国第一部聚焦创业公司的商业片，地位堪比美国的《社交网络》。

那部电影当年挺火，有人看到了友情、有人看到了梦想，还有人看到了演技终于在线的黄晓明，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到了电影故事背后那个悄然崛起的“教培宇宙”。

教培行业最初的形态，单纯只是为了给有留学深造需求的学生提供语言上的帮助。但很快，随着经济发展、高校扩张，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面临高考的竞争。行业发现，自己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因需求带来的高额红利，也随之吸引了无数资本注入。

教培行业从“小作坊”，到“帝国”再到“宇宙”，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教育之于中国，从来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减负”、“全面发展”等话题多年前就被提起过，但那条通往未来的独木桥从来没有改变，拥挤着想要过河的孩子只增不减。

今年7月，“双减”政策引发教培行业突变，两个交易日，教育类上市公司的市值至少有2000亿元灰飞烟灭。

面对此情此景，茫然失措的不仅是手握资本的投资者、踌躇满志的从业者，也包括很大一部分家长和学生。

### 0 到 49 万

从已有的公开资料，很难精确知道中国第一家教培机构是谁，所有教培行业的雏形几乎都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从北大辞职的俞敏洪为凑够留学的费用，在废弃的厂房创办新东方。

做访问学者的尹雄，为了学吉他凑学费，成立了巨人学校。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张邦鑫，因兼职做家教受到启发，退学创办学而思。

那个时代的创业者们，还没有如今在演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能力，即便是俞敏洪也多次表示自己年轻时授课十分木讷，企业管理更是一窍不通。

当年的北京海淀黄庄，从善缘街到丹棱街，从黄庄路口到北四环西路，道路两旁的灯箱楼宇广告，还多为显卡、内存、硬盘等数码产品。

行人在路上偶遇到的搭讪推销者，口中也多为“游戏、软件、VCD”这般内容。

那时，无论是教培产业的工作者还是身在校园中的孩子，都不会想到，未来学生的业余生活会被各种培训课程填满。

其实，最早寻求教培企业帮助的学生多怀揣着留学梦。因为无论是雅思、托福还是GRE，都是校园内不可能学到的内容。

敏感、饥渴、永不满足,或许是所有企业最终能通向成功的基础要素。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教培行业,其中包括在河南某贫困县一所中学教书的陈向东。他曾回忆,中学里每个班都塞满了学生,自己的班里有73个人,校长为了要好老师,天天要往教育局跑。

陈向东深知好老师的重要性,后被俞敏洪的梦想打动,加入新东方成为了一名GRE讲师。

较之陈向东,罗永浩则更加纯粹,他抱着“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的观点,通过三次试讲也加入了新东方,也成为了一名GRE讲师。

陈向东和罗永浩,二者在几年后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前者从新东方讲师做到校长再到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最终自立门户成立了全新的教培企业跟谁学;后者则通过讲段子、搞网站、砸冰箱、卖手机最终成为欠了6个亿的直播带货界顶流。

毋庸置疑,从上世纪90年代为起点,到新世纪后的20年,这30年,堪称中国教培行业的黄金时代。

彼时还没有“内卷”这个词,教培行业充斥着的全是“梦想”、“财富”和“未来”。

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共现存49万家教育培训相关企业。自2011年至今,我国教育培训领域共有4025个品牌/产品获得了融资,总融资事件6385起,总披露融资金额达到4875亿元。

2020年8月的数据显示,当时好未来集团市值为3395.55亿元人民币,中公教育、跟谁学、新东方等企业的市值均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

整个行业正在一路狂奔,即便耳边都是呼啸的风声,也不会有人停下。

### 从名师到名销售

行业草创期,从业者的逻辑依然是朴素的:教育取决于师资,人才质量决定教育质量、代表机构实力。因此如何把教育人才挖到教培行业来,就成为教培行业创立初期的重中之重。

在一家教培机构做了15年HR的张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初教培机构寻找名师的方式是去公立学校挖掘人才。

“最开始找退休的优秀教师,慢慢扩张到快退休的,最后甚至高薪挖年轻教师,这是随着教培机构的扩张逐步发生的。”

张莉表示,“在教培行业的最初,品牌效应不强,学生和家长会单纯因为老师的名气选择机构。谁家有XX附中和北京X中的退休老教师的资源,在招生上的效果就会立竿见影。”

起初,教培机构从公立学校挖教师,教师们是很抵触的,觉得自己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转做民营教育培训不体面,但当机构开出的价码水涨船高,抵触的情绪慢慢就被消解了。

当通过挖掘“名师”扩大招生后,教培行业开始内部“造星”,通过一定方式的培训将新入行的教师打造成为“名师”,罗永浩便是其中翘楚。

“那个时候来补习的学生其实要比现在优质,基本上都是学习不错的,老师只需要点拨一二或是指导一下方法,学生就可以迅速提高,所以在名师的作用下,学生反馈很好。”一位教培行业基层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但很快,随着行业的人局者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逐渐从增量变成存量后,仅从师资供应出发的产品思路,性价比变得越发低了。

只有学生不断增多,学费才会随之变多,庞大的系统才能维持继续运行下去。

小赵曾经是一名电子厂的技术工,他脱下蓝色的工服换上了白衬衫黑西裤,拎上皮包成为了教培行业的一名销售。

小赵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的工作是从学校门口发传单开始,每天拉着家长介绍课程,推荐试听课程,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谈成一笔单子。他还记得自己在深夜的快餐店门口等家长,向她推销课程,家长只是把用过的餐巾纸递给他,头也没回就走了。

“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要在马路上拦

车推销。”小赵回忆,当时公司在那个城市雇佣了接近 100 个销售人员。

行业内有个观点,“拥有一个好的销售团队,教培行业就成功了一多半。”

“当时为了抢客源,还会出现几家教培机构销售打架的情况,派出所我进过 3 次。但我卖的是教育服务,是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工作是有价值,也是值得的。”

但对于家长而言,教培行业从“名师”到“名销售”的转变观感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只知道,一个班的孩子都在外面上课,自己的孩子不上就要落后。

人们会习惯性地抗拒普通商品广告和推销行为,几乎每个人接到推销海景别墅或者银行贷款的电话时都会不耐烦地挂掉,但面对竞争愈发激烈的教育现状,看到扑面而来的教培信息,为人父母者却总是报以更多的耐心。

谁也不想错过让孩子可能跑快一点的方式,即便是要付出重金和牺牲孩子休息的时间。

试听、缴费、续课、转课、课程升级,伴随着花式“优惠”措施,教培机构的销售们给予家长们不断的刺激,教培行业随之进一步得到发展,企业越做越大,课程越开越多。

学校不教的,教培机构给你讲,学校教的,教培机构也给你讲。花钱买教育好像是钱最合理的归宿。“素质教育”在那段时间里,仿佛是一句笑话。

当然,资本总是会往最温暖的角落里钻,滚烫的市场,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人局者。

### 从线下到线上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之时,行业内就有部分“先行者”表示过,在线教育在未来,但那时没有人明白在线教育应该怎么做,如今特别流行的录播课、名师大班直播,甚至是 AI 课,在当年连个雏形还没有。

2014 年,陈向东开始耕耘线上教育,跟谁学的商业模式是对平台上的老师、机构收取会员费、流量

费。跟谁学平台上一个月的成交总额就冲到了一两个亿,但公司还是赔钱。

直到 2017 年,通过在线直播大班课,跟谁学才实现了单月盈利。2019 年 6 月,跟谁学宣布上市。到年底,营业收入超过 21 亿元,现金收入超过 33 亿元,净利润接近 3 亿元。

陈向东多次在内部会议中感慨:“跟谁学是撞上了移动互联网这个伟大的机会,运气好爆了。”

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给教育培训行业从线下到线上提供了可能性,那么 2020 年呼啸而来的疫情,成为了线上教育培训狂欢的开始。

在疫情的居家隔离期间,家长们为孩子课业而焦虑,纷纷开始上网搜课。

这一趋势直观反映在了 2020 年 9 月淘宝教育发布的《暑期在线教育创新势力榜》上。榜单显示,一批最受关注的 K12 机构在电商平台售出课程的整体增长超过 300%,其中猿辅导位列第一,暑期获得了 430% 的增幅。

多家在线教育公司在 2020 年内完成 10 多亿美元的融资,这是以往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 IPO 也不曾有过的规模。《中国企业家》杂志发文表示,2020 年,整个教培行业共发生 238 起投融资事件,整体融资金额达到了超 680 亿元的惊人数字,2019 年这个数字为 418 亿元,这意味着仅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该行业融资规模就超过了千亿。

巨额资本进入教培行业的这几年间,并不是没有隐忧,2020 年底,刚刚宣布上调课费的教培企业学霸君就出现暴雷,家长退钱无果,员工索薪无门。有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间,每天消失的教育培训机构超过 200 家。

针对暴雷企业的局面,无论是行业内还是旁观者,都将问题推给了企业管理者的能力和责任心。

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线教育品牌猿辅导更是得到了全面的亮相。猿辅导采用了两种方式与央视春晚合作,一是准备了 1000 万份“知识福袋”,用户下载猿辅导或者斑马 AI 课 APP,即可进入“成语填字”的活动入口。每完成一次成语填字即可打开一

个福袋,并有机会抽取实物礼品;一是在小品《阳台》中植入了品牌广告。

很快,就连新晋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也在教育业务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表示,在未来将持续巨额投入,长期不断地在教育领域进行创新。

这次,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教培行业的发力,明显的推背感。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在线教育和教培行业将会趁着这个风口,再次扶摇直上。

教培机构开始了新一轮的招兵买马,大量名校甚至是国际名校的毕业生投身到教培行业,从基层教育到管理人才全方位进行了一次升级。一名名校毕业生加入教培行业,一年可以拿到保底60万人民币的年薪。

就在猿辅导因春晚而家喻户晓前不久,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的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2021年要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把学生从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

这远不是第一次口哨声响起,在2019年7月,教育部等6个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培训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单节课长不得超过40分钟以及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等细则。

正在蒙眼狂奔的教培行业,不知是选择性失聪,还是没当回事,并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

2016年的绿企业年会上,作为嘉宾的俞敏洪曾对马云开玩笑地说,“10年内,阿里巴巴可能会在,但100年后肯定不在。而100年后教育会在,新东方也会在。”

同为嘉宾的马云则笑着回应,“10年内阿里巴巴也未必在,但是100年后教育肯定会在,但是新东方可不一定在了。”

两位大佬的玩笑斗嘴,让那次年会的气氛变得无比轻松。

谁能想到,5年后的夏天,阿里巴巴和新东方,好像都笑不出来了。

### 这次是来真的

如果说陈宝生在2021年除夕之前的讲话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那么他在今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中的话,显然更加有力了一些。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我们是不获全胜决不收手。一些违规的培训机构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就打持久战;跟我们打麻雀战,我们就打攻坚战!”

但教培行业依然选择性无视掉了这些信息。“减负”这个词提了十来年,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狼来了”的故事,行业已经听腻了。

4月2日,教育部再次召开新闻通气会,要求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学生睡眠让路。要求培训机构不得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作业练习、微信群打卡等形式布置作业。

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检查发现15家校外培训机构均存在虚假宣传违法行为,13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面对连续不断出台的针对政策,投资机构的反应更为迅速。根据财经媒体梳理,今年一季度,高瓴清仓了好未来和一起教育,老虎环球基金清仓了高



高思教育原办公地址,前台服务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栋楼1-7层正准备全面对外招租。

图/石若箫

途；景林则抛售所持的绝大部分好未来股票。

行业终于逐渐醒悟：这次似乎是来真的了。但教培行业内巨头本身的庞大体量导致的惯性，却让他们无法做到及时抽身。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严格控制资本涌入校外培训机构。

至此，靴子终于落地。退潮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先是相关中概股股价大跌，且跌幅都超过了两位数：美国东部时间7月23日，新东方美股大跌54.22%，高途跌近63.26%，好未来跌70.76%，网易有道、掌门教育跌幅分别为42.81%和35.22%。迄今为止，上述公司股价仍在底部横盘，没有丝毫反弹迹象。

紧随着股价大跌的，是大规模的人员和部门裁撤。好未来、高途、字节跳动等都宣布了调整通知。在好未来中高层双月会直播上，张邦鑫表示：“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能内部转岗就先转岗，不能转岗的，公司也会按照国家法律给予赔偿。”

包括新东方在内的多家企业宣布向已付费的消费者提供退费，改网课等服务。

但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足以支付当月工资和N+1赔偿的现金流储备。随着各大机构裁员流程的一天天进行，冲突和纠纷渐渐成为了常态。不少机构员工在脉脉等平台上曝出裁员消息，声讨公司的“暴力裁员”行为，诸如私下约谈、强制转岗、签订不合理赔偿方案、不出具正式的离职通知书等。

早在去年10月，字节跳动刚成立大力教育时，就开辟了一条硬件业务线，主要制造“大力智能作业灯”和教育平板、口袋学习打印机、儿童早教机、词典笔等多款硬件。

“双减”后，字节跳动内部传出，教育业务将全部

砍掉，做台灯变成了和教育最相关的业务。

8月10日，巨人教育董事会发布致员工函称，鉴于当下公司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问题，经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在转型方案未确定前暂缓一切支出行为。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工资不发社保不交了，赔偿也发不出来了。



8月11日，海淀区知春路的巨人教育门口聚集了少量讨薪教师，有民警在现场进行调解。图/石若萧

巨人教育一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简历了。以后大概率要转行，不会继续待在教育行业。但她还是想拿到钱，好让自己多一段时间的缓冲期。但目前看来，希望有些渺茫。

“我们现在这帮已经工作了两三年、三四年的，在招聘企业看来还不如新人。他肯定会觉得你之前在教育行业做不了，就着急了，就直接来我这了，但你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行业。”面对未来，她完全不知道何去何从。

《中国合伙人》上映八年了。八年前，谁也想不到影片的主角们有朝一日会处在如今这种尴尬的境地。

彼时的陈可辛，或许以为自己的镜头正在开启中国商业史上一段传奇的序幕，但却没想到很可能成了一曲时代终结前的挽歌。

电影中还有一句经典台词，如今看来，颇有意味：“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2021-8-15 中国新闻周刊)

# 人口忧思：“双减”“三孩”政策的逻辑基本盘是什么？

人口问题政策端频繁发力，在上周末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30会议）上，再次传出关于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最新指示，强调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和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中国政府对于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那么，一系列用于刺激人口增长的新政，对于中国人口增长到底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呢？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文章来源于“毛大庆”微信公众号。

今年以来，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到三孩生育政策的发布，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话题。

政策端频繁发力，先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被审议通过，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随后，《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强调将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在上周末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30会议）上，再次传出关于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最新指示，强调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和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

从政策端的频繁发力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那么，一系列用于刺激人口增长的新政，对于中国人口增长到底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呢？

## 反思一 “一孩”还没落实，就要鼓励生“三”孩？

2013年底，单独家庭可享受生两孩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施行近两年后，只有近170万户中国家庭生育了二孩，仅占政策适用家庭的15%。

于是2015年10月，两孩政策全面施行，之后一年，中国新生儿数量达到1846万，较此前五年的平均新生儿数量增加了140万，增幅约8%。而2016年也成为最近五年来的生育峰值，在随后的几年，中国新生儿数量持续回落。

1962年到1975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一波高峰，每年新生儿数量始终保持在2100万人以上，尤其在1971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9年，年新生儿数量超过2500万，甚至曾一度接近3000万。这已经接近21世纪后新生儿数量的两倍。

2015年，七零后女性的年龄跨度在36岁—45

岁之间，这一育龄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包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区间内。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年龄层的育龄女性总量最多。

这个年龄段也是医学理论上最后的育龄区间。而在两孩政策发布之前，已婚的七零后女性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有过生育经历。从这个角度上看，2016年的新生儿中，8%的增幅部分，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这部分已育一孩的家庭贡献的。

而在2016年后，七零后女性逐渐离开育龄区，育龄主力的年龄进入到八零后的区间，即27岁—36岁，这些中青年女性中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做好生一孩的准备，甚至还处在单身状态。而且，由于上世纪八零年代初，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因此，八零后年龄段的育龄女性总量，较七零后有所减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孩政策发布后的显性效果仅持续了短暂的一年就消失了。

刚刚发布的“三孩”新政，其直接意图是要刺激中国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而现在已经完成“两孩”生育计划的女性，很多已经都过了黄金生育期，在医学理论上已经不再适合生育。

所以，“三孩”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大。现在，政策更现实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尚未有过生育经历的育龄女性，并通过从经济负担、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解放、解决她们的顾虑，让她们可以放心地把“一孩”生下来。

今年5月底，三孩政策发布。从大逻辑上推演，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出的中国人口形势而迅速出台的。

三孩政策发布后，舆论声音并不统一，一部分声音认为，随着相关配套优惠政策的落地，对于中国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部分声音则认为，这种单纯从生育计划上的宽松，并没有触及中国生育率低迷的本质。

事实上，自2013年底至今近八年的时间，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一步步放宽，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那么，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呢？

## 反思二 中国人恐婚恐生的根源在哪里？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在古代传统的宗族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最大动力，传宗接代是每个中国家庭组建之后的基础使命与信仰。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时，家庭生养子女的现实意义非常重要。

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施行之前，中国家庭的生育计划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哪怕当年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窘迫，一些子女众多的家庭甚至为了每个月的口粮生计而节衣缩食，朝不保夕，依然不会有生育的顾虑。

在三孩政策发布后，很多媒体层面的民意调查都反馈了这样一个舆论态度：不想生育的最大理由之一是经济条件的束缚。同时，伴随着婚姻观的变化，厌婚已经成为需要重视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社会命题：大半个世纪前物质资源严重贫瘠的中国家庭都不会因为担心经济条件而不愿生育，今天的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忧虑？

要想破解中国家庭恐生的问题，可以从中国适婚人群结婚登记数量的变化上找到一些答案。

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今，中国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2013年共有1347万对，到2020年，仅有813万对，降幅近四成。

房价上涨同步带动了房租的上涨，尤其是城市核心地段、名校周边的房租，涨幅更是惊人。于是，购房、租房的开销，已经成为很多中国有子女家庭最大头的一块开销。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价格在本世纪持续上扬，2013年为5850元/平，到了



2020年,已经上涨到每平米接近万元,涨幅同样达到四成。

同时,对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中国家庭而言,结婚生子之后,在高企的房价之外,还存在另一项庞大的支出:教育成本。

数据显示,在“鸡娃”的教育氛围中,北上广深这四座超级城市的家庭平均育儿成本已经超过200万元,还有一大批一线城市的育儿成本超过百万元。

这两笔巨大的支出横亘在中国适龄婚育家庭面前,是破解中国人口增长乏力的根源所在。

由这两笔巨额支出所引申出的问题,也是近年来持续困扰中国家庭、乃至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也造成了很多人对组建家庭的畏惧和疲懒,更深层次地改变着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观。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逐渐对单身或丁克生活产生依赖和适应情绪,而对于结婚生子的传统婚姻观持抵触态度。

与表层的人口增长问题相比,中国年轻人已经逐渐形成的新型婚姻观,更加需要政策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疏导。只有从根源上破解了教育体制和房地产对于中国家庭带来的困扰,才能从实质上解决中国人口的大命题。一旦这种厌婚、拒生的婚姻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未来即便通过再多的经济补贴、政策倾斜手段来刺激生育,恐怕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 反思三 “双减”初衷与现行教育体制是否冲突?

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教育支出成本过重对于人口问题的消极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了“双减”新政,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的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

总览全局,这些政策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刺激中国人口生育率,尽快消除并扭转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在未来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政策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和落实情况上,对于中国人口增长

的刺激作用会有多大呢?

“双减”的新政之下,课外辅导机构关停,小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升学率排名被取消……这些措施只是从表层上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大量中国家庭对于孩子升学的择校及考试压力依然存在,包括小升初的竞争压力、中考的录取率压力。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家长们对于初中的师资及教学质量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高考填报志愿,而教育分流制度下,中考的难度也在逐年提升。

市场上现存的大量课外辅导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可以说,不是教辅机构主动去拉拢学生,而是市场选择了教辅机构。市场的选择,其本质就是观念的选择。我们已经熟知的中国家庭教育观中,存在着望子成龙、攀比成风、竞争恐惧、贵贱有别等逐渐形成定势的价值观。

校外培训机构中,还包括很多针对留学、海外学校申请服务的业务,如果没有从本质上扭转畸形的家庭教育观和价值观,可以想见,“双减”之后,留学市场的需求量可能将出现迅速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尽快修正由教育观念引导并日渐畸形的教育价值观。

如果想要从根源上减轻家庭教育成本,单纯以“双减”的行政手段,很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原来的教辅机构以政策擦边球的形式继续存在,包括1V1私教、课外辅导咖啡厅、社交关系的辅导模式……毫无疑问,因为躲避政策监管而提升的教育成本,学生家长仍在支付,且支付的心甘情愿。平台是没有了,但需求却依然存在。

### 反思四 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当如何改革?

如果要想切实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根源还是要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有步骤、有节奏地改革。

首先,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压力过重的问题,是否可以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周期,甚至根据国情、国力,直接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阶段?

这样做的好处,除了缓解小学、初中的竞争压

力,还可以将升学压力直接延后到高中,让孩子们有更宽松的成长环境,也让从前不堪重负的一孩家长们有信心再多生一两个孩子。

其次,在改革义务教育体系的同时,我国必须要尽快普及、前置职业教育板块。我在此前的文章中专门分析过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出路,很多年前,我们有中专、职高、技校的教育分流体系,但现在随着高考难度的逐年降低,大学生越来越多,走职业教育出口的学生越来越少。

其本质在于,一来是中国家庭的就业观中普遍包含着名校依赖心理,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考入名校后,子女在择业及职场上都会有先发优势;二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还非常不成熟,与社会企业的衔接度不高,导致很多职业教育的成材率堪忧,而中国企业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对于一纸文凭的认可度,职教体系的学生在毕业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一份薪资满意的工作。

第三,在“双减”政策之后,国家应尽快通过启动公共教育资源,将因为政策而消失的有偿教辅内容以公共教育平台的途径补充上来,让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到优质的辅助教育资源。

我认为,“双减”政策的初衷和整体策略方向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及家长需要一个“双减”的补充政策,才能切实有效地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

#### 反思五 房价高企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房价持续走高的现象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国家多次提出房住不炒的政策方向,这次7.30会议又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抑制房价上涨,而其背后的逻辑同样与人口问题密切关联。

正如前文所讲,婚姻登记数量的降幅与房价涨幅是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年轻人厌婚、恐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买不起房子。

要破解房价与生育率、结婚率的问题,就必须从

另一个问题反思:中国人真的买不起房子吗?

以现在北上广深乃至二线城市的房价来看,普通工薪阶层的中国年轻人,如果没有父母资助或换房策略,纯靠裸买,确实买不起。

但是,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还买不起小城市的房子吗?买不起大城市三四万元一个平方的房子,还买不起四五线城市三四千元一个平方的房子吗?

事实上,很多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无论出于经济考虑还是人生规划,已经放弃了在大城市置业的打算,但不买房,不等于居住成本可以缩减。租金依然占据着年轻人收入开销的大头,成为他们厌婚、恐生的心理根源之一。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意选择回到家乡置业安居,理由也非常简单:大城市的工作发展机会更好,医疗水平更高、教育资源更丰富,简而言之,大城市的公共资源更加聚集。

大城市的资源优势明显,于是年轻人都在向大城市聚拢,从而助推大城市房价上涨,房价高企让越来越多新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无力购房,于是这些适龄婚育的年轻人宁愿选择不婚、晚育、少生,以减少因为家庭支出负担对生活质量带来的损耗。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清晰的恶性循环,最终出口却落在了房价负担过重,导致厌婚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问题上。

当然,关于公共资源分配和城市发展、乡村城市化的问题,由来已久,非朝夕可以解决。但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要想打通房价与结婚、生育等关系中国人口的根源问题,仅凭单纯的行政手段调控,仅可治标,却无法治本。

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想让适龄婚育人群放心大胆、没有顾虑地生养子女,最理想的路径,还是要解决社会公共资源的整体分配问题,让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镇都能享受到更加优渥的医疗与教育资源。

唯其如此,人们才可能将置业目标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城市,从而减轻生育成本中最大头的一项支出。

## 总论 如何形成良性循环的政策逻辑基本盘

抑制房价也好,减轻课业负担也好,所有政策的指向都是为了带动中国适龄婚育家庭有信心、有能力快生、多生,从而尽快扭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利趋势。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下,当这些政策在没有任何损耗的情况下被落地执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逻辑基本盘是:

为适龄婚育家庭减负——适龄婚育家庭提升生育意愿——生育率提升——人口增长率逐年提升——人口老龄化趋势缓解——人口红利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以政策优惠的形式反哺适龄婚育家庭。

但在这个基本盘的背后,存在着两个有待完善的逻辑:

一是人口增长将导致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人才竞争的背后必然是家庭层面上对于优质稀缺教育资源的争夺。从市场化的角度看,稀缺资源的价值必将持续体现在价格指数上,从而再度导致教育成本的走高。

二是人口增长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的增加,可能导致改善型住房的需求量激增,商品住房“三稳”应当是中国商品住房的长期政策基调。所以,在需求提升的情况下,通过公共资源再分配、健全租赁住房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政策,形成有效的住房价格调控体系,是决策层应当未雨绸缪的问题之一。

诚如本文此前所述,教育体制改革可以让“鸡娃”教育没有存在的土壤和必要性;在城市发展及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有效重构,可以有机地调控房价,从而带动人口分布和人才流动。

## 写在最后

一切政策制定的初衷,都是为了让社会经济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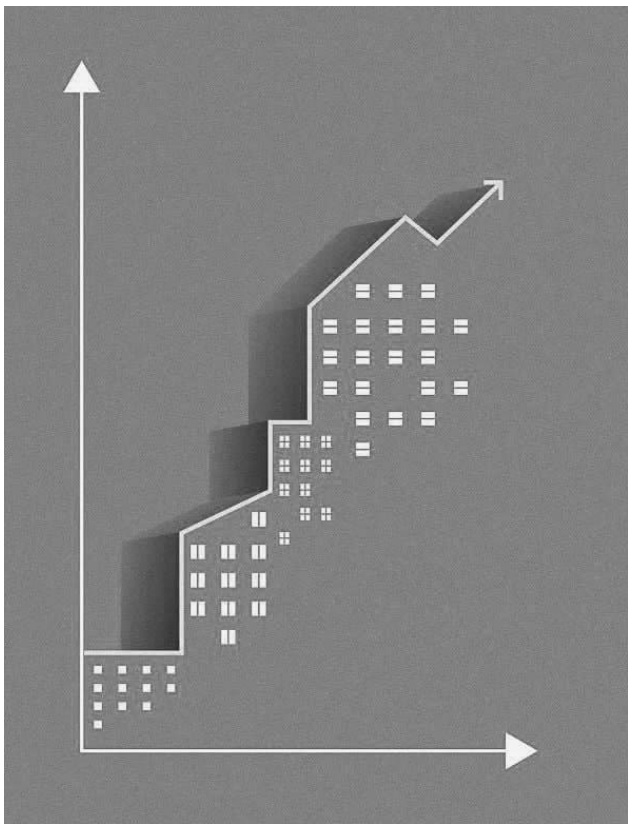
得更有活力与创造力,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教育公平、保障公共资源的相对平等分配,都是与政策初衷步调一致、方向一致的策略,也是治理病态商业模式和教育畸形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健康下一代、打造中国长久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前提。

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的目的应该是改变适龄生育人群的婚育观和中国家长的教育观,以及中国家庭对于上升通道的路径依赖问题。

用政策利好的实效,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业已形成的观念,再通过转变观念后的社会反馈持续优化政策。

观念与政策需要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成为彼此修正的参照物。

(2021-8-5 盘古智库)



(上接封三)

小说在当时引发轰动,一方面是因为题材新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中的预言非常大胆。有趣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那些大胆の設定很多已成为现实。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书里提到的电子表。此外,有很多令当时的人难以置信的科技手段,在当下也成了见怪不怪的日常。比如,小说提出,未来粮食和蔬菜种植可以人工干预,如今遍地存在的塑料大棚就体现了这一点。

“想象永无止境,它会不断更新。而每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科幻场景,都有可能以另外的形态在生活中出现。”王峰说,这是科幻作品与其他类型文学最不同的地方。后者如实地再现现实,前者却是人们不断模仿的范本。在大都市的城市设计上最能体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建筑,都在向科幻作品中的场景靠拢。“所以科幻书写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保有想象,并愿意创造未来。”王峰说。

**“人机结合写作是效率保障,网络文学或已走上末路”**

人工智能,在文学领域已然不算新鲜事物。2017年,微软曾短暂上线“少女诗人小冰”。小冰在程序中自我学习了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500多位诗人的现代诗,总计被训练了超过上万次。它写出的诗,风格鲜明,极具个人特质。相关机构曾拿它写的诗向刊物投稿,一些专业编辑审读之后,觉得达到了发表的水平。

王峰相信,5—10年之后,人工智能可以独立完成大体量的网络小说的写作,但成效如何,还有待读者检验。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写作者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文学创作。在这种工作模式下,网络写手在前期负责搭建小说的构架,设定成熟后,余下工作便可以交由人工智能来自动生成。这种操作模式将极大地提升写作效率。“过往写一部1000万字的作品,可能需要3年时间,但借助人工智能,两三个月就可以搞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一项集体工作。”

在王峰看来,如果依循这样的模式,网络文学走向衰落将成为不久之后的事实。他之所以做如此大胆的预测,同样也是基于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而成熟的个体创作时,那网络文学也就趋近于固化了。

在文学中,抵达未来并不是件难事。人们可以把想象力作为手段,用科幻和网络小说等方式做媒介,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但对于文学本身而言,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摆在从业者的面前。没人能准确预见未来的文学形态,也没人能说出另一个时代的书写对象会有什么不同。但起码,站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艺术的一种,文学并没有止步不前。它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我们在畅想未来的时候,很可能也正在见证某些奇迹的发生。

(《新周刊》593期)

